

杨“六郎”、焦赞、“三关”考实

——“杨家将”史事识小录

姜纬堂

“杨家将”故事脍炙人口，几于妇孺尽知。既往据史籍所载杨业一家数世事迹，以考此传说之来历、衍变及其史实背景，尤多筌路蓝缕、闾幽发隐之创获。然其间所论，亦不无未当人意之处。姑举杨“六郎”、焦赞、“三关”三事，以示未敢苟同，谨献曝于通家。

“六郎”解

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始见载于《隆平集·杨延昭传》。谓：“（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上呼曰：杨‘六郎’。”后之史籍皆沿其说，仅于文字略有更易而已。如王称《东都事略·杨延昭传》作：“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人畏之，呼为‘六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二作：“在北边二十余年，敌惮之，目为杨‘六郎’。”《宋史·杨延昭传》作：“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按：《隆平集》旧题曾巩撰，传即其元丰年间奉诏修《五朝国史》之底本，实与巩无干。但其书“自北宋之末已行于世”，足证其“虽不出于巩，要为宋人之旧籍”^①，宜其为王称、李焘等南宋时史家乃至元人所纂《宋史》取为依据，一再转承其有关杨“六郎”之说。

杨“六郎”之称，虽递经记录，但诸家于其本义却向无铨解。降及后世，遂傅会为排行第六，今之小说、戏曲、说唱皆然，甚至如近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分册亦谓延

昭为“杨业第六子”。考此说之最早记录，当为宋末元初徐大焯所著之《烬余录·甲编》。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②（以下简称《余考》）断为“必当时之‘杨家将’评话如此”，故为徐氏形于记载，甚是。从知所谓排行第六之解，最迟至南宋末业已形成，去今已七百余年。

史籍明载“上呼曰”、“呼为”、“目为”，是其必属后加之号，且来自契丹人之所称，实与天然之排行有间。求诸事实，则尤足证明“六郎”之本义决不关乎排行。《隆平集》、《东都事略》之《杨业传》仅载“业子延昭”，未记延昭有兄弟几人。《长编》卷二七谓：“（上）闻业死，甚痛惜，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其中“贵子二人”，系指王贵之子二人，因王贵与杨业同战歿，故一并推恩于二人之子。郝树侯《杨业传》^③（以下简称《郝书》）第五章据此谓：“看来杨业共有七子。同时以延朗领銜。”是将“贵子二人”亦算作业子而成“七子”，大谬。据《长编》所记，知杨业有六子，即录官之延朗等五人及从业战歿之延玉。其中具名者仅延朗、延玉二人。延朗，即延昭，乃因避宋圣祖讳（玄朗），而改“朗”作“昭”，具见诸书《杨延昭传》。《宋史·杨业传》则谓：“业既歿，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延瓌、延彬并为殿直。”合《传》中所记与业同歿之延玉，则业凡七子。卫聚贤《杨家将考证》^④（以下简称

《卫考》)以此段《宋史》之“次子殿直延浦”,应是次子延□、三子延浦二人,即“殿直”后脱“□延”二字,且不知此二字中之首字为何字,从而谓杨业“共计八子”。为牵合传说中之“八子”,竟曲解史文,实不足为训。《宋史》虽最晚出,但其系据宋之《国史》、《实录》等而来,延昭兄弟之数与名当以《宋史》为准。而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⑤(以下简称《翦文》)竟谓:“比较可靠的还是元曲中的名字与行次,最不可靠的是《宋史》所载。”按:此说实为偏见。姑不论其他,即杨延昭、延朗本系一人,元曲中乃分作兄弟二人,其误至明,何得反谓其最可靠?故应相信《宋史》所记。《长编》所谓业子“延朗等五人”录官,当如《余考》所言:“业死时延彬年盖尚幼,故赠官诏书中止录五人,延彬之官,盖后来所加恩。”据《长编》及《宋史》,当杨业生时,延昭已为供奉官,《宋史》且独著其为“子”,余者皆“次子”,《长编》亦以其领衔,足证杨业七子中,除战歿之延玉行次不详外,余者当以延昭居长。倘延玉长于延昭,则延昭必排行第二,否则当系长子。无论居二、居长,传说所谓之排行第六断非事实。

“六郎”一称既非关排行,论者遂别创解释,以加弥合。计有:

不清说 《翦文》谓:“照《宋史·杨业传》……则应为大郎。而《宋史·杨延昭传》又曰:‘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是知修《宋史》者对杨家兄弟的行次,已弄不清楚了。”

乳名说 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二十谓:“小字六郎。”所谓“小字”,即乳名。

总称说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谓:“业凡七子,延玉先没契丹,或总其见

在之兄弟六人(而称)欤?”

大排行说 聂崇岐《麟州杨氏遗闻六记》⑥谓:“其为六郎,未始不并从父昆弟而言,非必为同父兄弟中之行次也。”《卫考》谓:“或者是以大排行计杨延昭为第六,以小排行计杨延昭居长。后人以大排行言,故多目为杨六郎”。

将星说 《郝书》第五章谓:“古代往往以天上的星宿比拟世间的正面人物”,“‘南斗六星’在宋初已成习惯语”,因而契丹“赞扬杨延昭为‘南斗’”,“久而久之,‘六郎’变为‘南斗’的歌后语,以后就直呼为‘杨六郎’了。”常征《杨家将史事考》⑦(以下简称《常书》)第四章谓:“这星宿……可能是‘北斗六星’”,“契丹人畏之惮之,因而……称之为‘北斗六星杨延朗’,后‘朗’字演化为‘郎’,‘北斗六星’简化为‘六星’,‘杨延郎和杨六星便复合为杨六郎。”沈起焯《杨家将》⑧(以下简称《沈书》)更谓《常书》之说可为定论。

字讹说 骆承业《杨家将与杨家将戏》⑨谓:“《宋史》记其……为大郎,但同篇却又记其为‘杨六郎’。‘大’和‘六’字形相似。古籍的刻本、钞本中,两字往往相混。此处‘六’字当系‘大’字之误”。

检讨诸说,其实皆难成立。

《宋史》固以延昭领衔,余子皆居次,但仅说明延昭在录官诸子中居长,实未必就是大郎,亦有可能行二,所谓字讹说于《宋史》所记缺乏自《隆平集》而下之史源学的考察,乃独谓《宋史》字讹,纯属望文生意。所谓不清说,既贸然肯定延昭居长,又误以六为指排行,不谓己之未获的解,反谓《宋史》不清,自属臆说。史明谓“六郎”一名来自契丹人之所称,显与所谓乳名无关,更非“总其见在之兄弟六人”而合称之,故乳名说、总称说,皆无理、无

据。至于大排行说，也非事实。持此说之《卫考》，即据欧阳修所撰《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考出：“以大排行数，杨延昭亦不居六。”将星说注意到“六郎”一名来自契丹人之所称，差胜于众说，惟所言种种“歇后”、“演化”，未免匪夷所思，颇涉牵强，谓为定论，尤属过早。

然则“六郎”之本义究当为何？

窃以为诸书既谓其出自契丹人之所“上”、所“呼”、所“目”，则其必为契丹语所指之某事物。“六郎”，乃此契丹语事物之汉语译音。既可译为“六郎”，亦可译为“鹿狼”，乃至诸与此相近之字皆无不可。论者昧于其本契丹语之译音，仅于音译之“六郎”二字求其汉义，自必隔靴搔痒，难得确说。史籍有“上呼曰”之文，人或缘之以为对延昭之赞语；史籍有“惮之”、“畏之”之辞，又或缘之以为意寓震慑之号。究为何者，需据此契丹语之本义而定。惜契丹语早已不传，仅能得其鳞爪于《辽史》。检《辽史·国语解》及《辽史》全书，乃至清乾隆间所修《辽史语解》，皆未见与“六郎”相应之对音，今遂不能明其本义。然据史籍所言，其为契丹人所畏服之事物，则属无疑。明此，则据“六郎”二字汉义以求解之种种努力，实大可不必。

辨《元史》所载焦赞

《元史·焦德裕传》载：“焦德裕，字宽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按：指成吉思汗）兵至，州人开门降，用犹力战，遂获之。太祖嘉其忠壮，释不杀，复旧官，徇地山东。……德裕……官至福建省参知政事。……卒……赠光禄大夫，追封恒国公，谥忠肃。”按：此为焦赞之惟一见于“正史”处，故向为言“杨家

将”史事者引为典据，而谓“焦赞确有其人”。

愚意此实未必。

首先，焦赞之名不见于宋人所著史籍，即元人所修《宋史》亦未言及其人，乃突见于明初所修之《元史》，实不无可疑。言《元史》此项记载之意义，则仅足说明元人焦用、焦德裕父子曾以焦赞为远祖而已，断难证明宋时必有焦赞其人。查焦德裕父子之奉焦赞为远祖，既无史乘可考，复无谱牒可据，实乃姑妄言之，未可信为的实。此犹如《宋史·真宗纪》载大中祥符五年，尊传云较黄帝时代尤早之仙人赵玄朗为赵宗皇室始祖，上号“圣祖”，仅足证明宋真宗有此荒唐之举，岂可据而证明确有玄杳无稽之赵玄朗其人？

其次，自汉魏以来，世以门第相重，故崔姓者莫不自谓系出博陵，马姓者皆引伏波为祖。其间，谬托名门、妄附先贤者比比，岂可尽依其说，信为确实？南宋之际，出于世受辽、金之侮的爱国激情，民间说唱、戏曲之“杨家将”故事日渐风行，传说之杨家部曲将焦赞随之腾诸人口。焦姓古乏名人，谬引焦赞为祖亦不足奇。惟所传焦赞，实以抗御契丹扬名于世。而焦用附蒙古，为之“徇地山东”，焦德裕仕元，官至方面高位，其行径直与后世之洪承畴相类，竟借传说中焦赞之名以自重，托其名而背其行，可谓盗名欺世。在焦用父子，正欲假焦赞之名以粉饰其“大节”之亏。倘竟信而无疑，岂非堕其彀中？

再次，焦赞本出传说，其名在“杨家将”故事之演变发展过程中即有歧异，未可指实。《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写焦赞怒杀谢金吾全家后，题诗于壁，诗谓：“一十七口谁杀来？六郎手下焦光赞。”《焦光赞捉拿萧天佑》杂剧亦以焦赞别作焦光赞。是其人

究名赞或光赞，尚不固定，足证其本传说中
人，焉可视为实有？

再次、仅就《元史》所记而言，其间亦
颇有抵牾。所谓“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
关”，便属破绽。考之史籍，富弼实不曾镇
守瓦桥关。据《长编》，富虽曾于康定元年、
庆历二年间先后三次出使契丹，其间仅往返
途经当时宋至契丹之交通要冲瓦桥关而已。
其后，庆历四年（1044年）以枢密使出任河
北沿边安抚使，但瓦桥关关系其隶下，并非
其治所，亦不得称为镇守瓦桥关。计其时，
距杨延昭之卒（1014年）已三十载，倘延昭
健在应为八十七岁。即如“杨家将”故事所
传，焦赞之年齿小于延昭，则亦已八十左
右。以一八旬老翁，犹在戎伍，且镇守边
防前哨，未免不符常情。之有此说，当出于
焦用父子谬托远祖时之想当然，纂修《元
史》者取以入史，适足见其疏陋。

据上举四点，则焦赞之名虽见于《元史》，
亦不足论定确有其人。倘化除必以焦赞为实
有之成见，直以传说之艺术典型视之，自不
致昧于《元史》所载之史料价值，持为实有
焦赞之证。

由此而联系到雄县的所谓焦赞墓。清
·潘祖荫《秦轶日记》载：“今……雄县有焦
赞墓。稗官非尽杜撰，惜史无可考耳。”显
系以墓证其人为必有。《郝书》第五章引
之，谓：“潘祖荫是晚清考古家，他承认不
见于史传而口头流传的人物或实物未必不可
信，这话是正确的。”《常书》第九章除引
潘文外，更引《雄县志》所记“焦赞墓在亚
谷城”、《雄县新志》所载“《雄志》，于守
将录焦赞”，而谓：“可见，焦赞是实有其
人的。”按：今存雄县地方志，实以天一阁旧
藏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重刊之《雄乘》
二卷为最早。该志卷下《官师第七》，于
“守将”下录焦赞；卷上《山河第二》，于

“古迹”下记有焦赞墓。后世雄县方志所载
焦赞及焦赞墓，实皆源于该志。潘祖荫所记
虽闻诸人言，然其根源亦必在于该志。故查
明《雄乘》所记此类资料之来历，问题即迎
刃而解。关于“焦赞镇瓦桥关”，《雄乘》
已注明系据《一统志》。按：此即明正统间
李贤等纂修之《大明一统志》。该书卷二
《直隶保定府·人物》下列《焦用传》，乃节
钞《元史·焦德裕传》之文，所谓“远祖
赞，宋时镇瓦桥关”，便成为《雄乘》于
“守将”下录焦赞之根据。《元史》所载之
焦赞本不足据，则钞自《元史》之方志所载
亦无价值。其既源出《元史》，自然不足成
为《元史》所载之旁证。关于焦赞墓，《雄
乘》纂修者王齐附识谓：“《郡志》：‘西
楼村有焦赞墓’。今墓在山东长山。岂以赞
为（焦）用远祖，而误以用墓为赞墓耶？识
此以待博古者。”由此可知，当三百五十余
年前之明中叶时，所传之焦赞墓在西楼村，
而非亚谷城，当时之知州王齐已不相信此所
传焦赞墓为实。王齐致疑之因当有二：不
见封识、碑志；山东长山有焦赞墓。考《大
明一统志》卷二二《山东济南府》及康熙《长
山县志》，皆无长山县焦赞墓之记载，谅亦
系传闻而为王齐所误信。而墓无封识、碑
志，实不能令人无疑，况所谓“焦赞镇瓦
桥关”之说本不足信，则原传在西楼村，
后演变至亚谷城之焦赞墓，充其量仅能是
个传说，以之证明焦赞其人为必有，实属
乏力。三百五十余年前之王齐尚不肯轻信，
后世论者乃竟持以为确据，岂非咄咄怪事？

释“三关”

杨“六郎”镇守“三关”，乃“杨家
将”故事之一大关目，人所习知。然于“三
关”之所指，则历来又颇纷纭。综言之，凡
有五说。即：

瓦桥关、益津关与淤口关 《新五代史·周世宗纪》：“世宗下三关，瓦桥、益津、……淤口关。”《辽史·穆宗纪》上：“周末侵，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辽史·萧思温传》：“周主复北侵，……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四：“周世宗复三关：显德六年三月甲戌北征，……辛丑取益津关为霸州，癸卯取瓦桥关为雄州，及淤口关置寨（按：原讹作‘塞’，据《新五代史》、《元丰九域志》正），今信安军是也。”今之论者如《沈书》等皆持此说。

遂城关、益津关与瓦桥关 《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这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是那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

益津关、瓦桥关与高阳关 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上封事》：“（周）以数千之师伐契丹，兵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二引《高阳县志》：“五代周显德六年收复三关，建为高阳关砦，即三关之一也。宋属顺安军，与瓦桥、益津互相联络，高阳实为根本，控扼幽蓟，戍守特重。”《常书》第四章：“世人艳称的‘杨二郎把守三关口’的三关，是益津关、瓦桥关、高阳关。”

霸州、雄州与白沟河 《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一编者按语：“保定（按：此指清代顺天府保定县，即宋时保州故址，非指今河北省保定市）在宋时最为重地，是以杨延朗守此以镇三关。北以霸州为一关，西以雄州为一关，又白沟河为一关。”

宁武关、雁门关与平型关 《郝书》第五章辟专节述“战垒棋布宁武关”，虽未

明确回答三关究何所指，但据所论已不难知其意为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因为之概括，以备一家之说。

欲辨诸说之是非，先当明“三关”一词之所起。考“三关”一词，首见于五代时周世宗北伐之役。此前，后晋高祖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以贿契丹，从而换取契丹对其充当“儿皇帝”之支持。及周代晋，世宗矢志收复失地，以阻契丹南窥中原。显德六年（959年），周军出师所向克捷，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之瀛、莫二州，“关南平”^⑩。惜因世宗病发而罢兵，嗣后亦再未暇北伐。历周及北宋前期，皆以益津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霸县）、瓦桥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雄县）、淤口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霸县之信安镇）一线为北边，与契丹相峙。“三关”本唐季所置，后没于契丹，故史称周世宗北伐“收复三关”。“三关”既定，“关南”之地遂尽入版图。北宋承周之旧，杨延昭在北边二十余年，其所守者即此“三关”一线。

之所以于“三关”所指发生歧说，实因自周世宗收复“三关”后，即于益津关置霸州，于瓦桥关置雄州，而于淤口关却未置州，“仅止置寨，故《旧史》、《实录》皆阙（其名）不书”^⑪，致“三关”之以州称者仅余其二。后人昧于淤口关之湮而不彰，遂设法补其所缺之一关，而所补又各不同，或径舍之而另拟。考诸家所补、所拟，实皆出傅会。辨之如下：

遂城关 遂城为北宋时之一县，故址在今河北省徐水县。宋初属易州，太平兴国六年改属威虏军，景德元年改威虏军为广信军，治遂城，见《元丰九域志》卷二。咸平二年（999年）冬，杨延昭以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守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契丹每督战，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甲器固守。会大寒，汲水

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众”^⑫。时契丹劲旅大举南下，宋之守土官皆弃城而遁，独延昭坚守危城，卒却强敌，因之声名雀起，遂城因被号为“铁遂城”。^⑬其地虽系延昭四十二岁时大显身手之所，但其并非“关”，广信军虽为“同下州”，但在“州等”上并非“州”，元曲名之为遂城关，绝无根据，名之为梁州，尤属杜撰。

白沟河 白沟河为当时宋与契丹间之界河，宋沿周制于白沟河南设雄州、霸州为控扼之要塞。然考《通典·州郡》、《唐会要》、《五代会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玉海》、《宋会要辑稿·方域》、《文献通考·舆地》，以及两《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等记唐、宋、辽代政治地理之书，皆无以白沟河为一关之说，只雄州北临界河处有白沟驿，为当时宋与契丹间交通之所必经，但其并非“关”。所谓白沟河为一关，纯出想当然。

高阳关 故址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旧号关南”^⑭，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二月甲申，改关南为高阳关”。^⑮“关南”者，谓在周世宗所复“三关”之南也。缘其居于北边旧日“三关”之南，属于“二线”，又为自雄州白沟驿入宋境后，南至真定、大名乃至东京之交通孔道，遂成为据以支持“三关”一线之军事基地。宋初设关南兵马都监^⑯，继升格为关南兵马都部署^⑰，旋改名高阳关兵马都部署，以协同雄、霸、保、莫诸州驻军，控扼北边。是为宋前期河北四“军事路”（或称“帅司路”）之一，即当时河北最北部之军区。而在行政方面，高阳关则仅为一县，初属瀛州，后隶顺安军，为治所，熙宁间更一度省为镇，旋复为县。高阳关路都部署虽初驻高阳关，后则依

宋代“家法”，例由文臣出任之知瀛州兼领，作为“军事路”之高阳关路亦与作为“转运使路”（或称“监司路”）之河北东路合并，移驻瀛州（故址即今河北省河间县）。自熙宁二年（1069年）后，顺安军及其治所高阳县改隶河北西路（《元丰九域志》卷二），遂与驻瀛州之高阳关路分离。后世不悉其间原委，或径以瀛州为“旧名关南”，或径以故址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之高阳关，领有河北东路所辖自霸州以至景州将陵（今山东省德州市）之广大地域，杨延昭在北边任职最高、最久（九年）与最终之官职高阳关副都部署“等于河北边防总司令”，均误。尽管高阳关路之建置与北宋相终始，但其绝不能补充“三关”之缺数，“旧号关南”便属确证。

至于另拟之宁武、雁门、平型三关，其前二者为明代京师“外三关”^⑱中之两关，且宁武关、平型关之名亦非宋人所得知，合之而为“三关”，不符当时情事，况杨延昭任边事最久与功业最显赫之地实在河北，依理绝不当指其早年随父戍宁河东（今山西省）、且功业不显之时而言。是则此另拟之“三关”，于实于理均属未谐。《常书》已有辨说，兹不具赘。

所补与所拟具非，然则“三关”究当何指？

答曰：根本无须补、无须拟。自周世宗时已废三关旧名，改瓦桥为雄州、益津为霸州，降淤口为寨。宋沿周制，仍设雄州、霸州，惟升淤口为军（初名破虏，后改信安），并不曾于北边重设三关。当杨延昭守边之时，“河北有关一：瀛州高阳关”^⑲，并无“三关”。杨“六郎”镇守“三关”之“三关”，实为沿袭旧称之地域概念，即北边之同义语，并非具指三个关。谓即旧日之瓦桥、益津、淤口三个关固非，补沈晦之淤口关缺

数，或另拟三个关，皆属多余。

“杨家将”故事虽称镇守“三关”，实则皆指瓦桥关一地。《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中杨五郎谓六郎：“兄弟，闻得你镇守瓦桥关，怎到得这里？”《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杂剧等甚至径称杨六郎驻守之地为“瓦桥三关”，验之所演内容则仅瓦桥关一地，并非三处。“三关”也罢，“瓦桥三关”也罢，所指皆宋代之雄州，即旧日之瓦桥关、今之河北省雄县。明此，则小说、戏曲所谓“离却三关”、“来此已是三关”始可理解。倘必根究其为“三关”中之哪一关，岂非胶柱鼓瑟？是则足可证成“三关”非谓三个关之敝说。

作为历史地名，“三关”乃指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当杨延昭守边时，已无该三关之建置。所谓镇守“三关”之“三关”，实指北方边防前线。“杨家将”故事所称之瓦桥关，乃沿旧名以指雄州。实则杨延昭在北边二十余年，并未镇守过雄州。雄州固曾是高阳关都部署之辖区，但并非副都部署杨延昭所直辖。谓杨延昭镇守瓦桥关，亦属艺术家之想像，于史并无实据。故以为当时尚有“三关”、瓦桥关之建置者，误；以为杨延昭

镇守雄州（或瓦桥关）者，亦误；以为“三关”必即三个关者，尤误。

注 释

-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
- ②原载《辅仁学志》十三卷一、二期，1945年12月。后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 ③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84年新版。
- ④原载《说文月刊》四卷六期。后收入卫氏《小说考证集》，重庆说文社1944年版。
- ⑤《中原月刊》二卷一期，1945年3月。
- ⑥原载《史学年报》三卷一期，1939年12月。后收入聂氏《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 ⑨《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1期。
- ⑩《旧五代史·周世宗纪》。
- ⑪《新五代史·周世宗纪》。
- ⑫《宋史·杨延昭传》。
- ⑬宋·魏泰，《东轩笔记》卷一。
- ⑭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四。
- ⑮《长编》卷二三。
- ⑯《长编》卷二。
- ⑰《长编》卷二一。
- 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 ⑲《玉海》卷二四。

（本文责任编辑：解 繁）